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四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李 增 / 主译

19世纪诗歌
1800年—1910年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四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李 增 / 主译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世纪诗歌
1800年—1910年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4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4卷/ (美) 伯科维奇主编; 李增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117-0486-3

I. ①剑…

II. ①伯…②李…

III. ①文学史—美国 ②诗歌史—美国—19 世纪

IV. I71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6531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4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54 千字

印 张 38.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美国剑桥文学史》一书为美国文学作品的各个分支提供了崭新的、已获得广泛认可的研究方向与宽广的研究领域，其中也包括许多学者与批评家的文章。正是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今天文论研究这一主要领域才得以形成。这些作者对在30年中美国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均有涉猎，因此，他们的声音不仅仅体现了不同时代对文论的传承，也表现出了中断甚至颠覆。占据着较大比例的叙事作品能够立即使读者获得更加宽广的视角，并且对美国文学史形成一个全面的、彻底的认识，从前想要做到这一点则不太容易。而且，当传统批评的声音为这些叙事作品构建起背景的同时，它也与“兴趣的多样化”结为同盟，而这种多样化正代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特色。

本书涉猎广泛，以跨学科的视角记录了美国文学的各个流派与时期。近些年来，对过去被忽视的文本的重新挖掘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美国文学的研究材料，同时，研究相应材料的学术方法的数目与种类也在激增，使得两者相得益彰。在《美国剑桥文学史》中蕴涵的学术意识与批判精神的进取心是通过多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社会的、文化的、知性的以及美学的。它在文学研究中所展现出的权威性是以往任何记载都不能够与之比肩的。

这是第一部关于19世纪美国诗歌的完整叙述史，始于独立革命，历经内战、汹涌澎湃的多元文化阶段以及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大众社会时期。芭芭拉·派克深入挖掘了早期联邦诗人所擅长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讽喻体之丰富内涵，一度辉煌、至令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诗人如菲利普·弗瑞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所带来的纵深影响，以及由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与其他超验主义者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抒情诗体。希拉·沃罗斯基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内女性诗人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对非裔美国诗人的高度赞赏，包括书写圣歌的集体民歌作家。她揭示了从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到乔治·桑塔亚纳所代表的“上流社会诗人”的艺术鉴别力与情感深度，并且对这个时期内所创作的主要作品作出了全新的、发人深省的分析，涉及的作家从坡到梅尔维尔与克莱恩，再到该世纪的两位诗歌泰斗——沃尔特·惠特曼与艾米莉·狄金森。本卷书的各位作者在谈论这些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时，既采用了规范的学术专业视角，也注重这些成就与不断变迁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运用了这样的方法，他们得以对19世纪美国诗歌进行了再审视与阐释，为我们在21世纪的研究带来了愉悦、益处，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与方向。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



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 5 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 30 页篇幅论述 18 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总编寄语

在这里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对本项目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雷·赖安在文字编辑上的指导。此外，我还要对我出色的研究助手——彼特·巴提几各致以谢意。从私人关系的层面来讲，我还要向我的妹妹尼乃奥·西格尔以及我的妹夫查理·西格尔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与前面几卷相同，本卷的《序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5段）由我执笔，从总体上概括了这个以多卷本形式呈现的研究项目的构思与目标。第二部分（第5—8段）则描述了本卷的框架与主要内容，是我与尼尔·多兰（目前为多伦多大学的助理教授）合作的成果。他既是一位杰出的美国文化语言学家代表，同时也是本书理想读者群中的一员。我很荣幸他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对于我们的这项合作成果，他是主要撰稿人。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大事年表》的编辑工作，在此我对他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萨克文·伯科维奇
哈佛大学

美国诗歌传统，1800—1855

在这里我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学术评议委员会对本项目的认可与支持。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进修中心，我获得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员基金，并在此期间开始了这项工作，并利用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假期将其完成。在加大洛杉矶分校的两位同事，保罗·希兹与托马斯·沃斯姆非常积极热情地与我讨论19世纪英美诗歌方面的问题，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



情。约翰·侯兰德与大卫·波奥姆威茨作为联络人员奉献了自己的大量时间，也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我的两个聪颖的助手，安妮·希汗与马丁·格瑞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最后要提到的是萨克文·伯科维奇，他在全书的编写过程中既扮演了批评者的角色，同时又是鼓励者与建议者。

芭芭拉·派克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诗歌与公共话语，1820—1910

我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同时也是最后要感谢的人的都是萨克文·伯科维奇。在我们共同为本项目求新谋变的过程中，我深感与他共事合作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我还要感谢哈罗德·布鲁姆，他始终都在引导着我体验诗歌。同样的谢意致予我从前学习诗歌与文化时的老师与同事，他们是：埃莫瑞·艾略特、罗伯特·菲格、约瑟夫·弗兰克、杰弗里·哈特曼、约翰·侯兰德、A. 沃顿·利兹、爱兰·川克坦博格。我也要感谢苏里·巴兹来、桑迪·艾米莉·巴迪克、塔瓦·赫伯特、贝弗莉·赫维兰德、迈克尔·克雷默、科瑞斯坦尼·米勒、伊拉那·帕蒂与杰弗瑞·珀尔，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在我编写这卷书的时候，非常高兴有他们的陪伴与支持。我还要感谢给我提供研究基金的以色列文理学院与给予我充裕假期的希伯来耶路撒冷大学。我还非常怀念逝去的哥哥加里·沃罗斯基，并且想对我的父母大卫·沃罗斯基和布兰奇·沃罗斯基，以及我的丈夫艾瑞尔·维斯，致以真心的谢意。我还希望把该卷的这一部分献给我的孩子：陶亚、伊拉扎、塔马和璐米。

该卷中所用的材料曾被发表为：

“美国犹太象征学：艾玛·拉扎罗斯与耶稣形象”，《证据文本》16：2，1996年5月，113—125页。

“桑塔亚纳与哈佛形式主义”，《拉里坦河》18：4，1999年春季号，51—67页。

“女性的圣经”，《女性主义研究》，28：1，2002年春季号。

“修辞的主张：朝向历史诗歌”，《美国文学史》，15：1，2003年春季号，14—22页。



“处于身体之中”，《剑桥艾米莉·狄金森指南》，温蒂·马丁主编，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129—141页。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之重新印刷出版已经过阿默斯特学院的许可。该学院负责《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三卷本，托马斯 H. 约翰逊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由哈佛大学校长与校务委员会委员授权，1951，1955，1979）与《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拉尔夫·W. 弗兰克林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之贝尔克纳坡出版社，由哈佛大学校长与校务委员会委员授权，版权 1998）这两本书的印刷与托管。

希拉·沃罗斯基
希伯来耶路撒冷大学

序 言

这部多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揭开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新篇章。1917年出版的第一卷《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帮助开辟了一种英文写作的新领域。30年后由罗伯特·E. 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主持编写的《美国文学史》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展现了一代美国人为重新划定文学研究领域的界限所付出的努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学者和批评家们，不仅成了美国写作领域中各个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方向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已经开辟了并且继续开辟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

过去的30年，美国式的文学批评已经从人文科学研究的边缘进入到中心。该领域的研究活力体现在全国乃至全球不断增长的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上，体现在学术活动的规模上，体现在论辩的激烈程度上。更有意义的是，美国文学文本已经成为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焦点。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和其他的研究都已经渗透至批评界的各个角落，但这些研究的唯一最大基础却是美国文学，对于有关多元文化和经典形成的争论也是如此：虽然争论是跨历史和跨文化的，但最后都促进了美国图书的繁荣。

尽管我们置身于这些辩论之中，但很清楚，它们所激发的活动，涉及到大规模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和低估的文学作品，为思想的复兴和新研究领域的开辟提供了源泉。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复数形式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s*）的内涵，它植根于对美国的不同传统、不同美学甚至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坚持。

上述的发展拓宽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题材。对这一代的批评家和学者而言，美国文学史不再是一致认可的美国名著的历史，也不再是建立在一致认可的美国写作历史视角基础上的历史。虽然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追求持续进行，但是这种追求却是在目前批评的非中心化氛围中进行的，充满了争论、派别以及不同阐释流派之间的对话。

这一冲突场面标志着学术权威结构的转变。自18世纪以来，所有文学



史的写作实践都取决于既定的对文学史本质的共识上。今天对这种共识的痴迷看起来更像是呼唤妥协、缅怀旧事。如今，美国文学史研究将自己确定为一种多义的、多元的学术、批评、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就成为了一种调节既相异又相连的知识领域的功能。我们将其称为存异的权威。它一方面部分地存在于异质性能量之中：各种各样的竞争群体，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另一方面又存在于批评家关联能力之中：将其方法的特殊性转换成一种挑战和交战的形式，结果它实际上获得了与其他阐释方式相关的内容与深度，虽然有时它与后者互相补充，有时与后者相互冲突。

这套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无论是在强调差异还是在主张协作方面都称得上是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权威性使它成为描述专业化了的市场文化的代表。这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讲是多元的：美国多民族文学联合史。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代表性质也充斥着矛盾。这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是对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学术领域内持续争论的一种表述。书中的一些叙述就它们所揭示的社会和美学成就之间的关联性来讲是令人赞佩的。其他的一些叙述则明显的与此背道而驰，甚至达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一种对自由多元化批判的程度。然而，赞成与反对的立场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反对性立场展示了《剑桥美国文学史》一书中传统的一面。反对性批评所摆出的道德高姿态——文学分析作为对抗和不同选择视角的领地——植根于我们从浪漫时代所继承的关于艺术的定义。早期的、高雅的文学观主张蕴含在伟大作品中的理想的普适性。因此，言下之意，在其所宣称的艺术自主性方面，在其直接抨击西方资本主义风俗习惯之中，这种文学观孕育出了一种宽泛的伦理—美学唯信仰论——用阿诺德的话来说，文学是对生活的批评。到本世纪中叶，这样的批评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抨击，另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产生。

这里对立和非对立方法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性的视角成了问题。人们采用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后民族化（或者后美国）视角的提出。本书的一些分卷中暗示出了一些对这一视角的修正，或许可以预兆或影射未来的文学史。这里的“America”这个词大体上是指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在历史上即将成为美国的那些领土。虽然撰稿者中的几个人采用比较文学式的、跨大西洋式的或者泛美式的框架，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讨论了采用其他语言书写的作品，但是他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中的英语创作的作品上面——即人们一直所普遍认为的具有民族含义的“美国文学”。对我们而



言，这种限定表示了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毫无疑问，这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时间、空间、训练以及可利用材料的局限性；但是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本书的撰稿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局限性。他们充分利用了时间、空间、训练和新近获得的材料把民族性变成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的英语文学，对他们而言，“America”既不是一个叙事的受惠人——一个假设、不可避免的或自然的前提，亦不是客观背景（民族历史）。恰恰相反，它是许多种类文学——历史探究的论争场所。一个过去声称中立、对所有权威派别都彬彬有礼的领域，细查之下，变成了一个过去和现在都胜负难料的战场。

本套书中的“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即美利坚合众国。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标记，一个民族的标记，由如下事物构成和维系的民族：口授法令，一套普遍原则，社会凝聚战略、社会抗议呼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审美理想，一个现代性比喻（如“进步”、“机遇”、“新事物”），一个包容一切的符号学（“熔炉”、“拼贴被子”、“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一个排他的符号学，不仅排除了旧世界和南、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而且排除了美国范围内的许多大型群体。一个被如此构思的民族性就是一个充满修辞色彩的战场。这套多卷本中的“美国”就是探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一个飘移不定、视角繁复的焦点。

无独有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文学研究领域对于历史的理论化建设从来没有如此的敏锐深刻和普遍深入。毋庸多言，能够把本领域内那些特别兴趣、把我们当前各种不同学派连接在一起的是对历史的不可遏制的兴趣，这种兴趣既是思想、隐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也是我们所阅读的文本实体，更是我们阐释文本的精神勇气。即使我们承认，那些伟大的作品，特别是由于其中的数处语言结构被提升到一种非凡的强度，已超越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即使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持久魅力会成为反复争论的源泉），然而，经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审美超越的概念本身也不能超越时间。如同其他的追求绝对性的主张（从信仰阐释学到科学的客观性）一样，关于高雅艺术的美学主张也是由历史塑造的。我们通过可辨认的历史意识来领略超越的特殊形式——如神圣灵感美学，含混、颠覆、不确定性美学。

对偶然性的承认渗透到历史写作之中。一些历史比另外一些历史更真实；一些历史一度被冠以“权威”和“全面”的庄严头衔；但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对特定历史瞬间的叙述，所以本套书也不例外。这里，我们的意图就是把局限性变成无限性的泉源。以往所有的美国文学史不是总体式的，就是百科全



书式的。他们或者对单一的观点提出武断的概括，或者提供一大堆简洁的、看上去很“权威”、“全面”的概述，仅仅是因为简洁、专业的综合这样的叙述阻碍了著者意见的发表。与此相反，在本套书里，美国文学史却通过复调式的大规模叙述展示出来。由于撰稿者的数量有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详尽阐述与众不同的观点（前提、论点、分析）；因此，每个人的叙述都是通过实证而不是断言来使人信服；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尽管存在差别）通过主题、关注的焦点、忧虑与期望产生关联，因为它们这是这一代美国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本套书撰稿者的选择首先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学术成就，其次是因为他们在熟知他们著述的批评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展示出美国人文学批评过去 30 年的成就。他们对这套文学史的贡献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链接和隔阂。他们对现在被列入美国文学标题之下的许多题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所表达的与众不同的激动和倾向极大地拓展了美国文学研究领域。而且他们反映了构成我们时代文学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种族的多样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种族的多样性成为我们的大学、教职人员 4 和学生的特色。

多样性特征也体现在本套《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撰原则上面。其结构的灵活性旨在适应美国文学史的多样性。一些主要作家不止在一卷中出现，因为他们不仅属于一个时代。一些作品文本会在同一卷里的几篇叙述中被讨论，因为他们对于不同文化经验领域都很重要。有时，某个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重述，因为它需要多重视角，例如，它同时涉及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它既是一个时代的高潮，同时又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这种重叠虽不是有意策划的，但是却是从一开始就受到鼓励的。这种随之而来的视角多样性正好与文学的丰富性和历史资料相吻合。同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相比，本套文学史对具体细节（作家、文本和运动）的叙述都更加丰富多彩、细致入微。

萨克文·伯科维奇 (Sacvan Bercovitch)

本套书的每一卷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一些优势。而本卷通过强调 19 世纪美国诗人与当时主导思维模式、文化信仰尤其是高雅文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冲突的关系，来展示自己的优势。这其中许多诗人的成就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功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当庞德和艾略特拒斥华兹华斯和丁尼生的浪漫方言为多愁善感、虚饰的和修辞膨胀的时候，他们同时含蓄地否定了出版于 1800 年至 1910 年间的大多数美国诗歌。本卷的撰稿人对 19 世纪



广大诗人——南方与北方，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予以特别的关注，借此提出了久被延误的判断。他们的方法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历史的。他们注意到当代读者不仅能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经典作品中获得乐趣，而且能从曾一度享有盛誉的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与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的作品中获得乐趣，甚至还能从那些不太知名但却风趣十足的莉迪亚·西戈尼（Lydia Sigourney）和艾玛·拉扎罗斯（Emma Lazarus）的作品中获得乐趣。他们还详细描述了诗人所处、所体验和所依赖的丰富历史语境。

芭芭拉·派克（Barbara Packer）在试图更新我们对19世纪前半叶的新古典主义诗歌的欣赏力时承担了严峻的挑战。她不仅反对现代主义的审美取向，而且反对浪漫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按照她的观点，只有当美国文学停止仿效国外经典的时候，它才成熟起来。派克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美国诗人，往往会担心自身乡土气息太浓。精通古典的和英语的形式使他们更够参与一个更大的欧洲传统。19世纪初期，在美国，即使是像乔尔·巴洛（Joel Barlow）这样的政治上激进的诗人也采用得体的新古典主义的双行体来宣告启蒙主义的黄金时代在美国的降临。派克在乔尔诗中发现的机智和抒情的美感同样也存在于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约瑟夫·罗德曼·德雷克（Joseph Rodman Drake）和菲茨-格林·哈勒克（Fitz-Greene Halleck）的诗节之中，他们都深受奥古斯都时代讽刺诗风的影响。即使在当时以浪漫主义为主的抒情诗时代中（这些诗主要归功于华兹华斯的影响），派克发现诗人们一直努力把荒芜的美国风景融入到前华兹华斯似的格律与修辞结构之中。

爱默生的诗歌是体现英国形式和美国题材之间张力的最错综复杂的范例。19世纪30年代初期他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发现改变了他的敏感性；在诸如《哈姆特利亚》（“*Hamtreya*”）和《马斯克特奎德》（“*Musketaquid*”）几首精美的诗中，他成功地采用了《丁登寺》（“*Tinten Abbey*”）中无韵体形式。然而派克指出，爱默生的大部分诗歌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双行体表达的浪漫主义主题和衍生于17世纪诗人赫伯特·密尔顿、约翰逊和马维尔的四行诗形式的特殊混合体。这位康科德城的贤哲可以为沃尔特·惠特曼的自由体诗喝彩，但却依然固守自己的承诺，坚持使用规范的词语模式。他对惠特曼的影响体现在哲理和灵感方面，而不是形式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直接的继承人是艾米莉·狄金森。狄金森的诗不仅展示了超越主义者对自我界限的关注，而且具有爱默生的格言般的、紧凑的、几乎粗糙的压韵方式。从联邦



制主义诗人^①到爱默生再到惠蒂尔这段美国文学史，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鲜明的关注和如此权威的阐释。

沃克的文学观点显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和变化性。希拉·沃罗斯基 (Shira Wolosky)^② 在强调广泛的社会问题基础上阐述了 19 世纪后半叶的诗歌。她注意到诗人以修辞方式参与了与流行文化形式的谈判。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对重塑女性谦恭品德、倡导女性返回家庭生活的义务所作出的努力。在现今被遗忘的或被低估的很多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包括朱莉娅·沃德·豪 (Julia Ward Howe)、弗朗西斯·哈珀 (Frances Harper)、海伦·亨特·杰克逊 (Helen Hunt Jackson)、爱伦·惠勒·威尔科克斯 (Ellen Wheeler Wilcox)、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露西·拉卡姆 (Lucy Larcom)、爱丽丝 (Alice) 和菲比·凯里 (Phoebe Cary) 等，沃罗斯基追寻到一种微妙的逻辑：通过修正过的屈服实现自我主张。她指出，家庭生活中的权威只不过是一种权威的形式，主张谦恭的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主张。这些诗人在公开宣称家庭生活和谦逊之属于私人领域价值观念的矛盾的行动中，成功地获得了一种公共的发言权。艾米莉·狄金森比任何人都更加热切地探索了这种悖论。沃罗斯基在狄金森戏剧性的隐密生活和诗歌中发现了一种无限挥发性的“充满激情的顺从”。

这个时期最强势的男性诗人们与文化普遍建立了同样复杂的关系。这一时期最深层冲突是南北文化的冲突，表现在诗人坡对朗费罗的沾沾自喜和道德说教的病态般敌视中。沃罗斯基指出，这两位诗人都对商业社会中诗歌所处的边缘地位表达出深切的失望，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却是各具鲜明的区域特色。一方面，一种温和的、贵族似挽歌般的轻浮语调弥漫在朗费罗的诗歌之中，似乎在召唤已经死亡或正在垂死挣扎的旧式文化，另一方面，坡那备受折磨的社会与思想的边缘化处境在否定诗学中得以表达。在沃罗斯基随后的人物讨论中，她精辟地辨别出这种对立策略——怀旧与革新——的几个变体。出生于上流社会的作家，诸如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 (James Russell Lowell) 和乔治·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 试图把诗歌语言从一个正在兴起的大众化社会中所呈现的急剧上升的多元化中分离出来。而赫尔曼·梅尔维尔、斯蒂芬·克

① 指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方政府的诗人。——译注

②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英美文学教授。著作有《狄金森：战争的声音》(1984)、《神秘语言》(1995)、《诗歌艺术》(2001)。——译注



莱恩和保罗·劳伦斯·邓巴^①却与这个社会的分裂、矛盾、对立和异化的直面交锋中创作出永久充满痛苦的诗歌。黑人圣歌的那些民间作者在充满启示录般的希望的诗歌中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残暴形式的抗议。沃罗斯基在惠特曼那里发现，他一直在努力使用比喻手法来克服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冲突，即“消极的”个人主义自由和那种可被感知的社区联结的需要。她认为，像本卷书中所讨论的许多女性诗人一样，惠特曼在他创作的高潮时期，在感情浓厚的诗歌中，包括表达社会义务的悲悼情感、诗歌（例如，悼念林肯的诗歌），找到一种市民—公共意识来消解自由个人主义。

无论是个人自由主义原则的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常常会对受控于个人自由主义原则的社会情感生活忧心忡忡。双方都应该找到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正像华兹华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诗歌是“情感的历史”，那么，我们这里就阐明人类的情感，因为人类情感在一个自由—个人主义日益增长的社会里正在遭遇体验的环境。后殖民主义与其文化根源的模棱两可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之间的困难交流，少数民族和女性的自我发现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寻求反消解的价值观，多元主义的多重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更易理解的社区的怀念，所有这一切被称为社会情感的问题都在 19 世纪美国诗歌中得到了阐述，并在本卷中进行了评论，而且，无论阐述还是评论都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派克从诗人们选择题材和形式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问题，沃罗斯基则从诗人对流行文化修辞的适应过程中找到了这些问题。但两人在诗歌与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样一来，他们在恢复和阐释了 19 世纪的美国诗歌传统中，为 21 世纪的我们提供了乐趣、收益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① Paul Lawrence Dunbar (1872—1906)，是美国第一位黑人职业作家，也是最早闻名全国的黑人作家之一。——译注